

同铸编辑魂

——读《我的遇见》有感

□ 傅绍万

2018年中秋节前夕,我们人大新闻系七八级同学在天津郊区县山环抱的九山顶聚会,邀请了天津日报的老报人王道生参加。天津日报是当年新闻系学生的一个实习点,王道生是我实习时的老师。分别37年重逢,没有分毫陌生感,心仿佛贴得更近了。

道生师已经78岁,他自驾车一个半小时提前赶来,参加过白天和晚间的活动后,又相约去他房间长谈,至凌晨不见倦色。次日早饭后,还主动当起司机,拉我和北京日报李培

禹同学重访采访故地。

走进生机盎然的青年林,我想起写进长篇通讯中的那句格言:昨天的梦想,可以成为今天的希望,也可以成为明天的现实。这种青春的朝气,不正在道生师身上洋溢、迸发?岁月流逝,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。退休后应出版社之约,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书,他确定采写的一位分管教育的市长,却蒙冤入狱。道生师书生孤胆,奔波于千公里外的马鞍山、合肥、芜湖之间,明察暗访一百余人,收集到确凿证据,做好了应对各种后果的准备,写成长篇报告文学《黄山之变》,今晚报领导同意刊发,一位好市长冤案昭雪。

聚会结束返程,我发给他一条微信:“道生师:此次聚会,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您,让我看到了一个记者的坚守,一个因为信念支撑永远年轻的人。”

转眼间六年多过去,道生师寄来新著《我的遇见》,一、二两册,百多万字,作家出版社出版,作为《王道生文集》第九、第十卷。

翻开书卷,沉浸于那些朴实、厚重,极具亲和力 的文字,禁不住拿起笔,写下这篇短文,表达对道生师的钦敬之情。

一

《我的遇见》,以作者一生经历贯穿。道生师是著名作家、报纸编辑、新闻记者。所遇所见,万象纷呈,但他的主要工作经历是报纸编辑,编文艺副刊,报告文学。书中所述,以编辑的人、事为多。由此,也引发、启迪我对编辑职业一些新的思考。

我从大学毕业到退居二线,36年间,主要从事编辑工作。其中,夜班编辑10年,副总编辑、总编辑20年。业内行话,总编辑也是编辑。出版社编辑、报刊编辑,新闻版编辑和副刊、文艺编辑,也没有不同。表面看,编辑工作是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里,办公桌放一杯清茶,在稿纸或电脑上勾勾画画。他感受不到四季的冷暖,风雨的来去,不识人间烟火气。真实的编辑不是这样。他是站在思想文化的前沿,历览时代风云变幻,和时代的脉搏跳荡在一起。他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,眼前有万家灯火的明灭,心中有黎民百姓的苦乐。他虽然以自心论事衡文,却是以百姓之心为心。这样的编辑,才能有披沙拣金的慧眼,琢璞见玉的匠心,识英才于未名时的卓见。

《我的遇见》,写作者自己遇见的编辑。他们有未出版的《在高中的日子里》的编辑,成名作长篇小说《园丁》的编辑,突破自我的长篇小说《魂曲》的编辑,他们共同谱写最可珍贵的编辑魂。其中,最让人动情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王维玲、李裕康和贵编邝夏渝。十年“内乱”结束,知识分子有太多的话要说,王道生也要把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写出来。《园丁》是他血的凝成、泪的化合、生活的记录,是为知识分子正名、立传的小说。他写了8万字,油印成小册子,在朋友中传看。天津日报文艺部看中了它,压缩成一万字发表。中国青年出版社看到了它,派出编辑与他见面,为他请了创作假,指导他写成长篇。初稿写成,又安排他住到出版社,静心修改。8万字的油印册子,终以20万字的名篇问世。领样书那天,他来到编辑部,带去了“五一”节供给的4盒恒大牌香烟,主任和编辑们分享了他的喜烟,吸烟话文,其乐融融。他回家后的第四天,意外收到一张特别汇款单,汇款人是李裕康,汇款金额是1元3角2分,附言条上写着:“道生同志:那天忘记了你烟钱,现寄上,谢谢!”

《园丁》成书和这张便条,折射出那个时代、那一代编辑人的风貌。他们不卑幼苗的稚嫩,培育它长成大树;不吝心血、汗水,滋养好书面世;他们还绽放心中的光明,照亮作者的灵魂,成书也成人。

二

人生机缘,道生师也成为编辑,先编天津日报农村版文艺副刊,后编天津日报报告文学。他要像成就他的编辑那样,成就他人。

他做的第一件事,是废弃铅印好的退稿信,每封退稿信都亲自手写。这就一下子把编辑和作者的心拉近了。投稿者越来越多,写信写不过来了,他就赴各区县办写作讲习班,白天讲授,晚上个别辅导。那个时候,一篇稿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文坛原本不出名的一大批人,因为在他主编的版面发表作品,从草根成长为作家,升任到重要岗位,有的甚至成了主编。

这是他写给朱国成的第29封退稿信了,朱国成还是投稿不辍,又寄来一篇小笑话。道生师不忍心再退,就给编发了,却引来读者来信批评。道生师不言放弃,不厌其烦地引导,还带着他写报告文学,把他领上了路,朱国成的作品不断见诸报端。他当上作家,“农转非”,成为区文化干部。

作家父亲又逆转了残疾女儿的命运,领她走上文学之路。朱明静幼年时,因一次医疗事故失听失语。到了人学年龄,父亲送她到学校,“学个兴趣”;教她学电脑,与她以家书形式交流、碰撞,让小明静的心智放飞;进入中考,老师、同学再顾不上这个残疾孩子了,父亲对她说:“你现在离开校园了,天高任你飞,海阔凭你跃。没有了沉重的负担,却有精神的自由。你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,去描绘你心中的世界。”2007年,明静开了自己的博客——“幸福猪猪的小窝”。两年后,明静把秘密创作的近20万字的《珍惜爱》献给父亲,出版社出版。此后,《猪窝日记》、《破茧成蝶》、《太阳花》等一本连一本问世。她成为中国作协会员,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学生,毕业后做了职业记者,在电视台用手语播报新闻。朱明静浴火重生,有编辑多大一份功德!

三

《我的遇见》中,浓墨重彩,写到对编辑初心的坚守,引起我强烈共鸣。

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,给出版业、报业带来巨大冲击。作为“铁肩担道义”的精神产品生产者,又成为拨拉钱串子的产业经营人。适应这个转变,是多么艰难!出现一些乱象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比如,好书出版难,滥书却在海量印刷;报纸高品位的版面、栏目,忍痛压、减,让一些不该登大雅之堂的内容占据

因为这个原因,我们编辑队伍中一个不小的群体,淡忘了东升的朝阳,只盯着西沉的落日;不为大好春光、无边际遇而精神飞扬,只为秋风落叶、运蹇路狭而意志消沉。

畏难发愁、怨天尤人,于事无补;观念固化,一成不变,必被淘汰;与世沉浮、随波逐流,智者不为。正确的态度,是执经行权,经是不变的编辑魂,权是踏平坎坷,拓开前行之路的本领。如果说一社、一报是盘大棋,一本书、一个版面、一个栏目,就是一子。全局和局部,循着同样的道理。

我任报业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编辑的年代,商品经济大潮汹涌,我曾对人自我调侃:我这个人,三分之一是“官员”,三分之一是报人,三分之一是商人。这有点像“怪胎”,大变革的年代,又属正常;三者似乎矛盾,又可实现统一。当好“官员”,就要守好舆论阵地;守好阵地,就要做个好报人,做强舆论;舆论影响力强了,经营就有了根基,就能成为一个好商人。虽然,三者的关系处理,并不那么容易把握,失衡在所难免,却是循着文化规律破冰前行。

《我的遇见》也说到当时的尴尬:报告文学版被淡化、压缩,报告文学成为广告文学,捧角文学,此门中一些高手,也下海折腾孔方兄去了。道生师始终守护着报告文学版这片净土,行人间正道,发人间真情。版面压缩,他有了更多时间,指导得意门生们写出更多精品。让自己得到解脱,做一个处于危亡之秋的报告文学的扛鼎人。

瓦釜雷鸣,更显黄钟大吕的震撼;庸凡暢行,意见好人美德的珍贵。《好人倒下了》,拨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,传遍全国。《父亲、弟弟和我》、《最初的父亲》,书写普通人的观念冲突、情感交织,撞击人的灵魂深处,拓展了报告文学题材。《山坳里的一家人》、《希望》,写出下层民众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认知和追寻,一经刊发,引来全国众多知名报刊转载。他还独辟蹊径,聚集几位志同道合者,创办了系列电视报告文学,把报纸登载的好文搬上荧屏。经费拮据,他们挤公交

车、吃地摊饭,住路边店,一身虱子……这帮“土八路”拍出的八集电视报告文学,首播一炮打响,风动京津,社会、经济两个效益共赢。

因应变局,执经行权,做竞争的胜者,同样是对编辑初心的坚守,且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宋代曾巩评《战国策》,有这样一段论述,“二帝三王之治,其变固殊,其法固

异,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,本末先后,未尝不同也……盖法者所以适变也,不必尽同;道者所以立本也,不可不一。”《战国策》记载的是两千年前的事,曾巩是一千年前的人,说的却是过去、今天和明天不变的道理,也为编辑人点破迷津。保持对道的坚守,心中始终留一片净土,存一方追寻的圣地,不迷向,不歧行,编辑人生才能活出价值。



真正的文化书写,是心与心相互照亮

□ 逢春阶

知道的独家故事”。

谁有那么幸运,中学生时写的诗,就得到臧克家先生的指点,且成了大诗人的“忘年交”?李培禹。谁能帮助王洛宾“圆梦”,在北京举办庆祝他艺术生涯60周年的大型演出?李培禹。赵丽蓉有一桩事压在心头,她把电话打给了谁?李培禹。谁让李雪健牵挂,得到他住院的消息,执意要来看望,鼓励他用信念战胜病魔,快乐生活?李培禹。这些传奇式的际遇背后,藏着书写者最珍贵的品质:以真心换真心的赤子心肠。一个热人心,写的文字必然贴心、暖心、润心。

书中写到一个耐人寻味的“意外”。1995年7月1日,也就是王洛宾音乐会大获成功的第二天,李培禹陪王洛宾在北京的胡同里转,走着走着,他发现,已经来到了赵堂子胡同15号——诗人臧克家的院落前。他知道,91岁的臧克家极少会客,可他还是按响了门铃。两位世纪老人、两颗文化大星意外相遇。文章说,这像是老天冥冥之中的安排。我要说,这是李培禹的诚心使然。

忽闻他的恩师、著名散文家韩少华去世的消息,他从下午一直坐在电脑前写到第二天凌晨,《著名散文家韩少华去

世》的消息,第一时间在北京晚报发出,引起文坛震动。而他绞尽脑汁写了十几个小时的稿子是多少字呢?600字。可以说,字字含情、句句凝泪。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后面,藏不住李培禹对韩少华老师的一片深情。与其说这是篇讣告,倒不如说是一篇精短散文,它映衬出著名作家韩少华的一生,“就像积蓄了一夜的露珠在晨光中闪烁”。正是这样的匠心,透射出副刊主编那沉甸甸的分量,是留恋的分量、张望的分量。

李培禹在《留恋的张望》中披露的独家往事,堪称文学、音乐、影视等领域名家的群像档案。比如1993年10月,有关单位给在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扮演政治部主任王文清的艺术家园方组织了一个追思会,会议内容都报道了。但有个细节没有,李培禹和几位同志搀扶老演员赵子岳离开会场时,老艺术家动情说的一句话,刻印在李培禹的脑海里:“一个伟大的人,最懂得自己的渺小。”又比如,写到报纸的一个“更正”的笑话,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报纸印刷还要人工检字排版,而且字模是倒着的,一篇报道中把北京市副市长、历史学家吴晗的名字弄成了‘吴哈’,错了,第二天更正:‘本报昨日一版消息中副市长吴哈,应为吴哈哈’。又错了,……只好再更正,第三天报纸登出来了:

‘重要更正:昨日及前日本报消息中副市长吴哈及吴哈哈,系吴晗。’”最后的更正,其实还是错的,而且是更错:“系”,“是”的意思。吴晗,还是吴哈和吴哈哈呀!培禹老师说这是真事。时过境迁,哈哈一笑,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大事件。李培禹特别会讲故事,比如“更正”的事儿,他见大家没笑够、没听够,又即兴添枝加叶地说,吴晗实在忍不下去了,打电话给报社……,后边演绎的故事更精彩,让大巴车上的所有人笑翻了天。这里我不“剧透”了,感兴趣的不妨去买本书吧。我想说的是,《留恋的张望》书中那些珍贵的史料,是作者平时留心所得,弥足珍贵。

书卷最深处,藏着绵延半个世纪的师生情。“后记”里那篇悼念恩师赵庆培的文字,字字皆是滚烫的传承。正是这位赵老师把他引向文学道路,让他知道了好多优秀作家、诗人,其中就有徐迟。赵老师成为影响他一生的人,在李培禹工作、生活都跌到谷底的时候,赵老师看到他万念俱灰,怕他有轻生的念头,严厉地对他提说:“李培禹你记住,这辈子不枪毙不死!”后来,李培禹把这句话送给作家刘恒听,刘恒把它搬到了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中,成为贫嘴张大民“贫”得最精彩的一句话。而《留恋的张望》就是遵照赵老师的嘱托而出的

书,但遗憾的是,书还没出来,赵老师却走了。李培禹大哭。他写道:“他生前的嘱托字字敲击着我的心;出本人物散文集要抓紧了,那是你的强项,我等着你给我送新书的那一天。”

书中写得最走心的是李雪健,篇幅也最长。这哪里是写文章,分明是哥俩的促膝谈心。一壶老酒,一碟花生米,你一口,我一口,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,聊着。激动了,站起来吼两嗓子;郁闷了,埋头干一杯。没有镁光灯下的正襟危坐,只有掏心掏肺的温热绵长。我一直羡慕这样的状态,这才是真兄弟。培禹老师患病疗养期间,李雪健专程来看望他,并为他的新书题字:“祝贺培禹的新书出版!老友:李雪健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”。

李雪健的“老友”二字,让我忽然明白了李培禹为什么要用“留恋的张望”做书名了。那些留恋的张望,是文化记者对四十多年经历的深情回眸;那些温暖的遇见,是真诚叩开真诚的永恒印记。当快餐式写作充斥版面时,李培禹用半生证明:真正的文化书写,从来都是心与心的相互照亮。是不是可以说,当文化记者、做副刊主编,到培禹老师这份儿上,就是历史了。

我愿意叫李培禹一声大哥,向大哥学习!

小逢

观察

在中国报纸副刊界提起李培禹,总让人想起夏日的清风和冬日的暖阳。他在北京日报副刊编辑岗位上躬耕多年,是我的前辈。我们经常在全国报纸副刊采风活动上见面,他那直爽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还有,在颠簸的路上,为大家解闷儿,他的妙语、警句常随着让人捧腹的段子脱口而出。我感叹,培禹老师的黏合度高、亲和力强,他跟众多文化名家都成了朋友,有的还成为挚友。我也采写过文化名家,我只是遥观,他则是沉浸式的“直观”、近观。最近,这位资深的副刊主编笔尖流淌出一本叫《留恋的张望》人物散文集,其中写的王洛宾、臧克家、李滨声、刘绍棠、浩然、赵丽蓉、乔羽、于蓝、李雪健等,读罢让人眼前一亮:这真是“你可能熟悉的文化名家。你不一定

